

作者序

經過多年耕耘，這部《香港廟宇碑刻志》終於付梓，回首過往，感慨萬端。這一項目的源起，還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2000年夏季，筆者曾到法國巴黎遠東學院做學術交流，當時，施舟人教授 (Kristofer Schipper, 1934–2021) 向筆者介紹了「聖城北京」的研究計劃，該計劃由荷蘭萊頓大學 (Universiteit Leiden)、法國高等研究院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北京大學和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合作進行，整理了北京東岳廟的全部碑刻，共計145通，上溯元明，下至民國，時間跨度長達606年。¹碑刻能夠提供真實具體的歷史材料，令研究基礎更為扎實，研究成果更具說服力，在地方廟宇的研究中至關重要，這讓筆者深受啟發。

回到香港後，在2001年和2002年的暑假，筆者和兩位研究助理開始了香港地區華人廟宇的田野考察，至今資料庫中仍然保存了許多當時的成果。然而，經過這兩年的考察，筆者不得不承認，僅憑一人之力，要完成全香港廟宇碑刻的資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只好無奈擱置了這一剛剛起步的研究計劃。

2006年初，由香港中文大學及蓬瀛仙館合辦的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大成立，筆者擔任中心主任。不久，廣東道教碑刻研究計劃正式啟動。該計劃由筆者主持，游子安教授、吳真教授和廣州中山大學的鍾東教授共同參與，研究範圍為廣州府屬以及其所領13縣，全面搜集其中和道教廟宇有關的碑刻文獻資料，經過大約五年的田野調查，和隨之而來的艱辛的文獻整理工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終於在2013年正式出版。²這一契機，讓筆者對重啟香港廟宇碑刻的研究又燃起了信心。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2011年，日本京都大學莫尼卡博士 (Monica Esposito, 1962–2011) 不幸仙逝，留下進行到一半的「《道藏輯要》提要」研究計劃。由於筆者之前已接受莫尼卡的邀請，共同主持中文版《道藏輯要·提要》的出版工作，為了不至令後

1 「聖城北京」的研究計劃後來由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呂敏 (Marianne Bujard) 繼承及擔任主編工作，至今《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已出版了五卷。

2 黎志添、李靜編著：《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上、下冊 (北京：中華書局；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

人空有魯殿靈光之歎，筆者於2012年接手了這一項目，隨即投入到繁重的研究工作中。組織學者撰寫、翻譯提要以及後續的編輯校對工作，幾乎佔據了個人的所有時間，迫於無奈，香港廟宇碑刻的研究項目再次被暫時擱置。直到2016年，《道藏輯要·提要》的工作走上正軌，筆者又申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的資金支持，得以重整研究團隊，再次開展香港廟宇碑刻與神誕儀式的研究計劃。

雖然在項目前期，筆者經歷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波折，但此時筆者已經出版了《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想來有了廟宇碑刻研究的訓練和經驗，此次重啟香港廟宇碑刻的研究，必然更加得心應手。

不料在真正開始之後，才發現情況與原來的構想相去甚遠。過去在香港廟宇碑刻的研究中，學界一直倚重科大衛 (David Faure)、陸鴻基、吳倫霓霞等合編的《香港碑銘彙編》³，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三位教授的這一成果不可謂不偉大，但此書以編年的方式排列碑文，並未直觀反映廟宇體系。作為宗教研究學者，深知應該將碑刻與廟宇的歷史結合起來，這一研究方法在廣州府的廟宇碑刻研究上已經取得了成功，香港廟宇碑刻也應該有一部這樣的著作。因此，筆者最初構想的，就是在《香港碑銘彙編》的基礎上補充完備，作一部所謂的「續集」。然而在收集、整理碑文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個新情況：一是田野考察發現了大量新碑，畢竟《香港碑銘彙編》的收錄年代僅止於1976年，在這之後的四十餘年，又有許多新碑刻立，於是筆者決定盡數收錄這些新碑，以建立香港廟宇碑刻歷史的完整圖像；二是隨著田野調查的展開，研究規模越來越大，《香港碑銘彙編》作為基礎已經遠遠不夠，而該書沒有提供的材料和圖像，只能依靠田野調查去「挨家挨戶」地尋找原碑。漸漸地，碑刻數量從《香港碑銘彙編》的190多通擴大到如今的455通，筆者意識到原先設想的「續集」是遠遠不夠的。

隨著項目規模的不斷擴大，考察廟宇的數量達到了最終的173座 (見本書下冊附錄7) 之多，這龐大的規模也給我們的調查帶來許多困難。在「有廟必訪，有碑必收」的原則下，為了查訪每一座廟宇，了解其建築狀況，並拍攝廟圖、碑圖、神像等，我們需要在全香港「上下求索」，不僅是九龍、港島的繁華鬧市，更包括了離島、新界的大量偏遠地區。其中，有些廟宇交通不便，比如大澳汾流村的天后古廟，汾流村位於香港地區的最西端，群山阻隔，在抵達大嶼山大澳地區之後，還需要從碼頭包船，駛入伶仃洋，經水路方能到達；有些廟宇位於禁區之內，通行需要相關證明；還有一些廟宇在考察時恰好暫時關閉，比如東涌的侯王宮和錦田水尾村的天后古廟，幸而後來得到兩位廟祝的幫助，讓我們再次到訪時得以入內。由於項目持續時間較久，部分前期考察過的廟宇在後來又新增了許多資料，為了確保本碑刻志的時效性和準確性，我們不畏繁複，力求獲得最新的一手資料，以至於有幾座廟宇竟去過四次之多。

3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三冊 (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

遺憾的是，隨著時間流逝和都市發展，一些歷史悠久的廟宇在翻新之後，未保留原有的舊碑，甚至有幾座廟宇已被整體拆除，不復存在。雖說即使是金石也有埋滅的一天，遑論廟宇或者碑刻，但有碑刻志傳世，能記下香港的這一段歷史，亦可謂不幸之幸。

此外，由於學期中要承擔大學裡的教學和行政任務，因此田野考察大多只能在5月至8月的暑假中進行。香港位處炎方，天氣酷熱，廟宇又常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我們的團隊經常要在烈日之下行走山路，蚊蟲擾人，行路艱難，其中辛苦自不必言。加上這幾年頻繁爆發新冠疫情，廟宇常常因防疫需要而關閉，更令原本就艱巨的考察任務被延長了許久。研究香港廟宇，必須倚重一手的考察成果，二手材料只能作為參考，傅斯年先生曾借用白居易《長恨歌》的「上窮碧落下黃泉」來形容收集研究材料務求窮盡的精神，我們也秉承此句所教，努力尋找廟宇碑刻，力求沒有遺漏，而能夠親身參訪、拍攝並考察歷史，這一切的辛苦也有了價值和意義。

在這一過程中，筆者常常被問到，為什麼道教學者要研究香港的華人廟宇？作為研究道教經典和儀式的學者，筆者一直深受施舟人教授的影響，認為道教歷史傳統、經典和科儀，與當代道教的田野調查同樣重要，二者互相印證，均不可忽視。1995年筆者博士畢業回港，開始從事香港正一派道士的科儀研究，在與正一派道士的交往當中，發現他們會經常前往鄉村做太平清醮，筆者也跟隨他們去了新界、離島的許多村落考察。透過對大埔泰亨、屯子圍、龍躍頭、石澳、吉澳、高流灣、塔門等村落打醮儀式的研究，筆者認識到要了解道教在地方上的存在狀態，就不能忽略地方廟宇的角色，比如不少地方的太平清醮道教儀式和廟宇有著密切聯繫，道士會在廟宇外面立壇行儀。另一方面，研究道教儀式也擴大了我對香港廟宇歷史的認識。此外，在廟宇研究領域，道教學者可以提供不同於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的研究視角，前者往往更關心廟宇的宗教向度、神明崇拜，以及神壇分佈、祭祀傳統和神誕儀式等等。所以，對香港廟宇的碑刻、歷史和儀式的研究，也是地方道教研究的一部分，是道教研究的延續，而並非一個新的議題。總而言之，香港廟宇碑刻和歷史，能讓學者更加了解道教在地方社會發展、存續的實際情況，廟宇和道教儀式、正一派道士以及道教信眾的關係，都是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維度。

完成漫長的前期準備之後，本書終於進入了撰稿階段，在實地調查的173座廟宇中，130座有碑刻傳世，碑文共計455通，本書的主體內容即由此構成。在編排體例上，本書採取「以廟帶碑」的形式，以每座廟宇為單元，收錄其中可考的碑刻。書中由筆者所撰寫的「廟宇簡介」部分尤其注重廟宇歷史發展的考證，這一部分也具有特殊的意義——若沒有廟宇的介紹，碑刻收集的意義會大減，而利用碑文去考證廟宇，也展現了碑文對於廟宇歷史書寫的作用。

這一龐大的項目絕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必須依靠團隊的力量，筆者在其中的角色只是一位規劃者、研究者和撰寫者。整個研究團隊的工作內容包括田野考察、拍

照、錄文、整理校訂碑文等，不單要處理文字，還要處理大量的圖像。多賴於眾人之力，在此一一致謝：首先感謝本項目最親密的研究成員：何璇博士、陳文妍博士和梁斯韻博士，她們在不同的階段加入，協調整個項目的日常工作。其次是筆者的幾位道教研究方向的博士生：郝中寧先生、楊楚珩小姐、黃綺婷小姐和張媛小姐，他們在碑文錄入和繁複的校對工作上給予了許多幫助；陳彩霞小姐和姚蓓兒小姐為書稿進行了耐心細緻的校對，何慧敏女士和香婷婷女士則負責大量的圖片編輯工作，讓圖像的呈現更加精美、真實；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許多廟宇的司祝為我們提供了無私的幫助，此處篇幅所限，無法盡錄大名，將另附名單，以致謝忱。同時，感謝為書稿作序的三位好友，他們是陳金樑教授、梁德華主席和林赤有理事長。還要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對本項目部分研究經費的支持（Project ID：2110290，2017–2019），更蒙蓬瀛仙館慷慨資助出版所需的款項。最後，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貫專業出色的工作，為這部龐大的書稿完成文字排版和美術設計，特別是編輯張焯軒先生，他和幾位同事耗費了大量時間心血，才有了這沉甸甸的三冊合集。

香港廟宇碑刻數量巨大，內容豐富，打開這座文獻寶庫，讀者自會驚歎三百多年來香港地區的歷史、社會和宗教的巨大變遷，亦同時深深慶幸，如此豐富的香港廟宇傳統可以一直得到保護和延續。從社會歷史文獻的角度而言，本書學術價值甚高，這次大規模收集的成果，擴大了未來香港地方廟宇歷史研究的範圍和前景。從保存香港廟宇碑刻文獻的角度而言，本書也極具參考及研究價值。筆者希望《香港廟宇碑刻志》的出版，不僅能為未來的香港廟宇研究提供資料與參考，更能為其他研究者打開學術進路。筆者亦深知，出版的成果僅止於目前階段，囿於精力和條件，難免有未能盡善盡美之處，這亦留待未來的有心人加以補充。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22年11月20日

陳金樑序

地方廟宇在香港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地位儘管無法具體評估，但顯然十分重要。地方廟宇並不在主流佛、道教機構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這類廟宇時常被主流宗教忽視。然而，正因如此，它們更為靈活，也能更好地滿足當地社區民眾的特殊需要。透過這樣靈活的形式，地方廟宇形成了一個獨有的信仰空間，漸漸與所服務的社區的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這種情況並非香港獨有，但香港本地廟宇在整個香港特區都有很強的影響力。部分廟宇還廣受捐贈，正說明了其在香港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書收錄了130座香港地方廟宇的圖像、碑刻和地圖，可稱得上香港廟宇信息的精煉典藏。但正如編著者黎志添教授所指出，本書的編纂目的，並非收錄全香港的廟宇信息，而是著重展現那些有碑刻存世、或曾有碑文記錄的廟宇。通過不畏辛勞地反復在地考察和研究，本書總共收錄了455通碑刻，最早的碑刻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單憑這一點，本書已經有了重大的學術貢獻。除此之外，本書內容經過精心策劃，黎教授為每座廟宇撰寫了摘要，介紹其歷史及所在地區的發展狀況，還收錄了廟宇中的保存相關文物，如銅鐘、牌匾，或其他具有研究價值的建築元素以及科儀器物，亦記載了該廟所供奉的神明、主要儀式和節誕等廟宇宗教研究領域的重要元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導論〉能很好地將讀者引入香港地方廟宇的世界。

每座廟宇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僅見證香港社區的發展，也積極參與了城市變化發展的過程。本書正是將本地廟宇歷史置於香港發展的宏觀背景下進行審視和探討。這是最顯著的特點，讓這部著作既似一份地圖，更是一部編年史。通過閱讀碑文，我們可從中了解更多關於廟宇、地方文化和地方歷史的信息，也會對香港有更深的認識。黎教授和他的團隊試圖保留的正是這樣一種了解香港的方式，謹此致謝！

陳金樑

香港中文大學常務副校長、利榮森中國文化教授

2022年8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梁德華序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學得到蓬瀛仙館的資金資助，共同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經過逾16年的努力，無論在教育課程、研究計劃還是學術出版方面，中心都堪稱成績斐然、碩果纍纍！

在教育方面，「道教文化證書及文憑課程」為有興趣了解道教文化的人士（包括道教宮觀團體及一般大眾市民）展示了道教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更為國內各地道教學院的學員帶來了新的視野，培養了數百位道教界人才。

中心還創造了數個全球「第一」，如出版全世界唯一的道教研究國際雙語學術期刊——《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推出全球首個「道教數位博物館」等，這些都對道教研究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研究計劃和學術出版方面，中心多年來將研究成果及學術會議論文結集出版，成果斐然。最近，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便出版了《道藏輯要·提要》（2021），集合了各方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現在《香港廟宇碑刻志》的出版，對道教文化研究和歷史文獻的保存整理來說，又是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消息。

《香港廟宇碑刻志》收錄了宋代至今香港地區（香港島、九龍、新界和離島）的華人宗教廟宇碑刻文獻資料——共計130座香港地方廟宇的455通碑刻，並附有廟宇的圖錄和歷史介紹。

《香港廟宇碑刻志》參照中心2013年出版的《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一書，採取「以廟帶碑」的研究方法，以每一座廟宇為單元，每座廟宇的碑文為子單元，先介紹該廟的創建及發展歷史、所在地區的發展變化，及廟內保存的歷史文物包括碑刻、銅鐘、雲板、彩門、石額、楹聯、牌匾等，又著重介紹廟內供奉的神明、節誕活動和祭祀儀式等宗教內容。讀者透過廟宇的介紹，便能輕鬆掌握本地廟宇碑刻的歷史、作用及其研究價值。這種將碑刻文獻和廟宇歷史變遷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對提升學界廟宇碑刻研究的水平有巨大的幫助。此外，香港廟宇與道教信仰關係甚深，一方面其供奉的神明多源自道教的神仙譜系，另一方面廟宇的宗教活動與道教儀式亦多有關

連，透過本書，讀者能深入了解更多道教信仰習俗及文化傳統。與此同時，本書還為每一通碑文撰寫了提要，讓讀者能更好地把握該碑的內容和特色。

本人相信，《香港廟宇碑刻志》將成為研究香港地方廟宇的可靠指南，也是香港廟宇近代發展史的寶貴文獻材料。在此，祈盼大眾能夠通過研讀這些資料，從中體會香港廟宇的發展歷史。

本人藉著本書的付梓，衷心祝願黎教授和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繼續在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和歐美等地區的道教研究學術界之間，積極發揮促進學術交流的橋樑作用！

梁德華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BBS，MH

2022年10月14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林赤有序

——新成一卷書，慶誌廿載功

諺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當中「精誠」二字典出道家《南華經》。《南華經》〈漁父篇〉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古人深信最純淨的真心真意不止能感動人，甚至能感動天地萬物，即使最堅固的金石也能為之開裂。不過，現實中要金石開裂，並非單靠「精誠」就可以辦到，更遑論勒石為碑。然而自古以來，人們為了把重要的文字刻在石上，不惜工本開採石材、雕鑿石碑、刻寫文字，只期望碑文能夠讓自己的「精誠」感格上蒼，告知大眾，並使這份情感能夠藉由碑石的不朽流傳後世。當人們站在石碑之前時，亦可以憑著直覺感受它所承載的歷史和情感之厚重。

對於學者來說，碑文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要收集這類資料殊為不易，不但要長年累月跋涉往返各處，臨場抄寫、拍攝記錄時更要與場所負責人溝通交涉，過程十分耗時耗力。學者若非懷抱精誠，一般不輕易涉足這類研究。今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不懼艱難，通過十數載的文獻收集和實地調查，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130座廟宇及455通碑文輯錄成書，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壯舉。為求內容明晰透徹，編者特地為每篇碑文撰寫按語、校記和提要，使全書內容更加翔實豐富，極盡心思。對於香港宗教史、文化史、地方史的研究來說，這部著述的面世都是一大貢獻。此外，香港建築物特別容易受到都市發展的影響，對於後人來說，本書亦為這一刻的本土廟宇和碑文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錄。

雖然編者從歷史背景和學術角度出發，把本書研究對象定義為「華人地方廟宇」，但其實這些廟宇大部分都與道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通觀本書所收的130座廟宇，其部分供奉的神明多為道教聖真和得道真仙，例如玉皇上帝、玄天上帝（北帝）、呂祖孚佑帝君、文昌帝君、關聖帝君、天后元君（媽祖）、城隍神、黃大仙師、譚公仙師等等。從廟宇數量來看，主要供奉媽祖的佔46座，約為全書收錄廟宇總數的三分之一，必須一提的是，全書收錄年代最早的一篇碑文（南宋咸淳十年〔1274〕）亦來自天后廟。與此同時，編者在碑文提要中亦指出，不少廟宇會禮請道士主持法事和醮會。由此看來，即使這些廟宇並不屬於道教傳統派別，但也可將其視為道教信仰在地方社

會上的一種形態，反映了道教信仰如何深入華人社會，並影響大眾生活和民風習俗。本書既是一部香港華人地方廟宇的記錄，亦可以說是香港道教發展史的一篇補章。

蓬瀛仙館創立於1929年，道脈源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山三元宮，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全真龍門派道觀之一，同人向來抱著「弘道立德，濟世度人」的信念，致力服務社會，弘揚道教信仰和文化。本館為推動道教學術的發展，於2002年起與香港中文大學展開長期合作，從最初成立「蓬瀛仙館道教學術研究基金」，到2006年組建了「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多年以來，仰賴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的主持，中心在研究、出版、課程、活動、交流等諸多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學術界和道教界的共同認可。本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推動道教學術發展已有二十年，中心最新完成的《香港廟宇碑刻志》，於此時剛好可作為這二十年的一個紀念碑和里程碑，可喜可賀。今本書即將付梓，本人代表本館同人，是以為序。

林赤有

蓬瀛仙館第二十五屆理事長，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二零二二年歲次壬寅菊月謹識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